

孙机 著

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从历史中醒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孙机 著

从历史中

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著作财产权人：©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 孙机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108-05615-3

I. ①从… II. ①孙… III. ①文物—鉴赏—中国—文集
IV. ①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918 号

封扉题签 孙 机

特邀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 数 287 千字 图 305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 1 鸾鸟、神面与少昊 1
- 2 三足鸟 16
- 3 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 21
- 4 古文物中所见之獏 32
- 5 麒麟与长颈鹿 38
- 6 猎豹 45
- 7 金丝猴 54
- 8 历史上的唐三彩骏马 63
- 9 关于“黔驴” 74
- 10 豆腐问题 78
- 11 释“清白各异樽” 86
- 12 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 91
- 13 中国古代的葡萄与葡萄酒 99
- 14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103
- 15 商周的“弓形器” 118
- 16 车战没落的原因 132
- 17 玉具剑与璚式佩剑法 138
- 18 禽兽纹刀环 161

- 19 鼓与钲 170
- 20 说阆中之巴 176
- 21 床弩考略 182
- 22 古代城防二题 189
- 23 中国古代的平木工具 200
- 24 托克托日晷 213
- 25 汉代黄钟律管与量制的关系 224
- 26 焦作窖藏出土的杆秤 229
- 27 记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鼓座 239
- 28 中国梵钟 243
- 29 佛像的火焰肩与火焰背光 257
- 30 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 271
- 31 中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 285
- 32 汉代的跳丸飞剑 295
- 33 魏晋时代的“啸” 300
- 34 金明池上的龙舟和水戏 305
- 35 江陵凤凰山汉墓简文中的“大桺” 315
- 36 “温明”与“秘器” 322

37	“明火”与“明烛”	331
38	水禽衔鱼缸灯	346
39	绞胎器与瘿器	352
40	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	358
41	三子钗与九子铃	365
42	鹦鹉杯与力士铛	371
43	刺鹅锥	376
44	镇	381
45	中国早期的眼镜	392
46	谈谈所谓“香妃画像”	397
47	沟通古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次实践	403
	——评《古诗文名物新证》	
48	固原北魏漆棺画	409
49	“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质疑	423
50	关于一支“‘唐’镂牙尺”	431
	跋	444

1 鸮鸟、神面与少昊

天津博物馆所藏徐世章先生捐赠的一件玉雕，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的极精之品，其图案具有标识性的典型意义，而且造型优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中实属罕见（图 1-1）^{〔1〕}。从结构上分析，它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一昂首展翅的鸟，当中为人首，下部为承托上方二物的基座。

先对当中的人首试作探讨。这一部分的纹样虽简单，然而特点鲜明。其顶部呈介字形，脸上有一对由旋涡纹构成的圆眼睛，两侧是两只向下弯曲的大耳朵。以前曾将此玉件定名为“青玉鹰攫人首佩”，恐不确。因为这里的人首应代表神面，而不是“被鹰攫取吞食”的“祭品”^{〔2〕}。只要拿它和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之著名的龙山

玉圭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清官旧藏之龙山玉圭上的刻纹相对照，便不难识别（图 1-2）^{〔3〕}。三件神面的顶部均呈介字形，并向外探出短檐，耳部左右伸张，眼睛均由旋涡纹卷绕而成，造型的基本特点完全相同。顶部呈介字形的神面，首先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较完整的图像见于浙江余杭反山及瑶山等地大型墓葬所出玉器上（图 1-3:1、2）^{〔4〕}。尤以反山 12 号墓之 98 号大玉琮的刻纹最为



图 1-1 山东龙山文化
玉鸮
天津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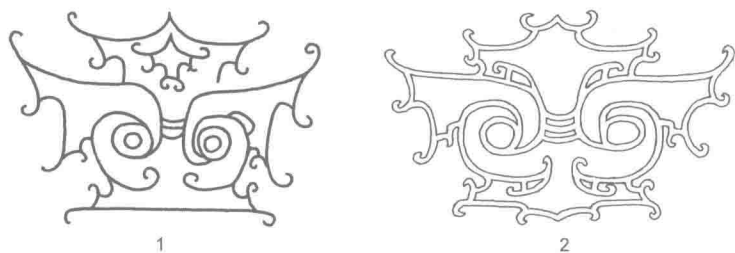


图 1-2 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的神面纹

1. 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玉圭
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圭



图 1-3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面纹

1. 玉琮，浙江余杭反山 12 号墓出土
2. 玉饰件，浙江余杭瑶山 10 号墓出土
3. 玉饰件，出处同图 1-3:1

精细，琮上的神人戴羽冠，冠顶端合尖突起，两侧平扩复下衍，构成了介字形的轮廓。但介字形顶虽然在良渚神面上广泛出现，却并非全都代表羽冠；有的从构图上看显然并非羽冠，可是也呈介字形顶，因知这一轮廓乃是良渚神面上习用的标志（图 1-3:3）。此种造型为山东龙山文化所接纳，这里的神面亦呈介字形顶。不过良渚玉器上的神面又分两种：一种无獠牙，另一种有獠牙；无獠牙的多为梭形眼，有獠牙的多为圆眼或旋涡形眼。后一种虽与立鸟玉件上的神面之眼均为旋涡形，构图却有微妙的区别：形成良渚旋涡眼的沟槽是从外眼角向内卷绕；形成立鸟玉件神面之眼的线条则从内眼角向外卷绕。不仅这一玉件如此，存世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的介字顶神面之有旋涡眼者也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山东龙山文化之神面的眼型虽与良渚文化有别，却和红山文化之玉神面上的眼型相一致。红山玉神面体横而扁，两侧有突棒及勾形物，和那里的勾云形玉佩之意匠约略相通。其旋涡眼系由两颊下部琢出的沟槽沿抛物线向额前延伸，再从内眼角向外卷绕，围住镂成圆孔的目睛，和此立鸟玉件之神面上的眼型如出一辙。红山玉神面的底部皆雕出一排巨齿，或五枚，或七枚，极具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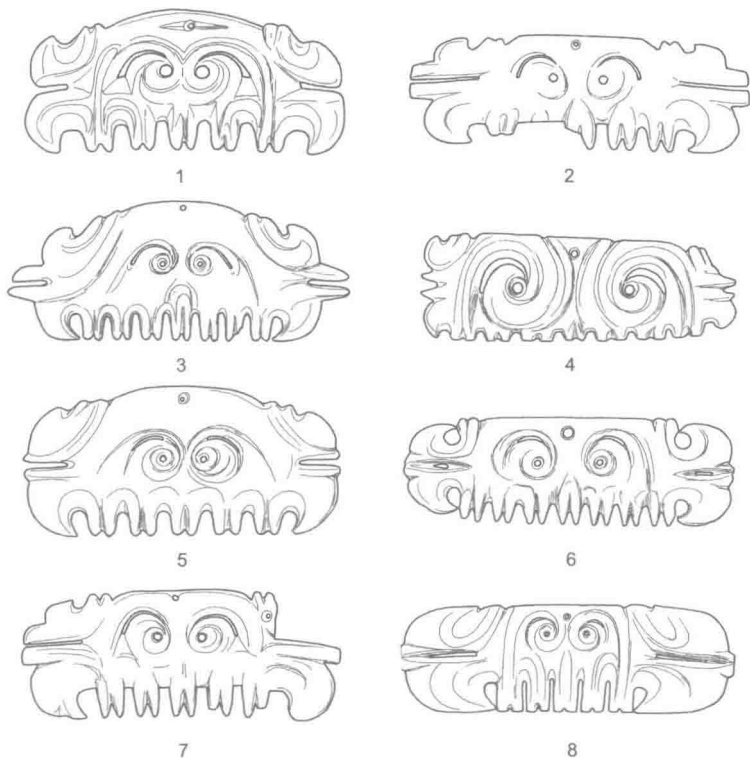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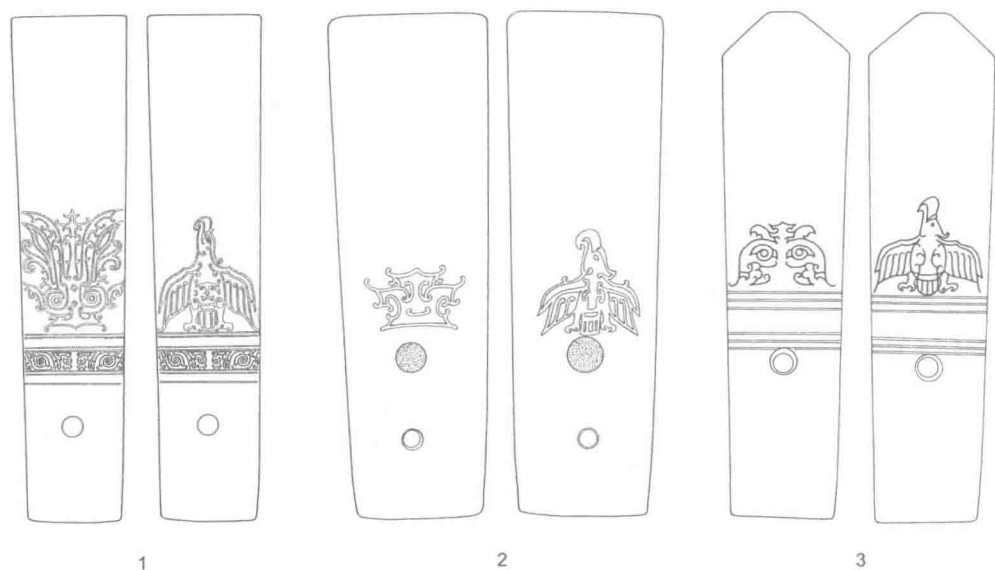


图1-4 红山文化的玉神面

- 1、2. 香港关善明氏藏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台湾仰德堂藏
5.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6. 天津博物馆藏
7. 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
8. 辽宁凌源牛河梁出土

《山海经·海外南经》与《淮南子·本经》均提到古有神人或神兽名“凿齿”，郭璞、高诱在注释中都说其齿状如凿，则正和红山神面上的大牙相合，故不妨暂称这类神面为玉凿齿。由于红山文化的年代较早，所以山东龙山玉件上的旋涡眼应接受过红山文化的影响。可是红山玉凿齿的顶部仅稍稍拱起（图1-4:1、3、5、7），或径作直线（图1-4:2、4、6、8），无呈介字形顶者^[5]。从而又可以推知山东龙山文化玉件上的神面之介字顶与旋涡眼并非同出一源，而是分别得自良渚与红山。

然而从整体上看，此玉件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上面的鸟，它高踞神面之巅，复为既对称又铺张之华丽的基座所承托，睥睨傲岸，大有不可一世之气势；与其构图相类似的玉器尚未发现过第二例。但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有一类玉圭，一面琢立鸟纹，另一面琢神面纹，已将上述立鸟玉件之图案的基本要素包含在内，只不过把二者分镌于器物的两面而



已。其中工艺最精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清宫旧藏的一件，长 30.5、最宽处 7.2 厘米（图 1-5:1）^[6]。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此式小型玉圭，长 14、最宽处 4.4 厘米（图 1-5:2）^[7]。天津博物馆藏玉圭，长 25.2、最宽处 6.2 厘米，但上部两角已被磨去，似经过后世加工（图 1-5:3）^[8]。上海博物馆所藏此式玉圭，长 14.8、宽 6 厘米。此外，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琢出立鸟与神面的玉圭，但其鸟纹刻得太浅，只能隐约地辨识出大致的轮廓。但这几件玉圭的出土地不明，所以有人怀疑它们是否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其实尹达先生于 1936 年发掘日照两城镇时就注意到这类器物，他指出这里的龙山文化墓葬的出土物中“有玉质的带孔扁平式斧，它略似殷代的圭。这样的东西和两城镇遗址中一种石斧相似”^[9]。邵望平先生对此也举出日照尧王城和栖霞杨家圈出土的玉圭为例^[10]。可见玉圭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特别是 1963 年两城镇又出土了那件两面均刻出神面的玉圭，其图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圭上的刻纹极相似，更为后者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图 1-2）。立鸟则见于山西侯马牛村春秋晋国祭祀坑出土的玉圭，显然是后世对古物的再利用^[11]。又山东滕州前掌大

图 1-5 山东龙山文化玉圭

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天津博物馆藏

晚商遗址出土的残玉件上，尚可见琢出的鸟翼与鸟足，其完整的图形也应和上述玉圭上的立鸟接近（图 1-6）；这就是本地之前代的遗存了^[12]。所以无论玉圭的形制以及神面和立鸟，均有出自山东龙山文化的证据。不过上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玉圭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玉圭之花纹均为凸起的阳线，两城镇玉圭上的神面却是阴刻；工艺技法上的区别又为问题的提出留有余地；前三件玉圭与两城镇玉圭是否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遂又引起怀疑。实际上这几种技法是可以共存的，天津博物馆所藏玉圭两面的图纹就是阴刻。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玉圭上既有阴刻的神面纹，也有以剔地阳线表现出的神面纹，而这件玉圭也被研究者定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13]。相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花纹多用阴线刻出，良渚玉器上虽有凸起的面，却缺乏凸起的线。而以剔地阳线即现代所称勾彻技法刻出纹饰的圭，即所谓“瑑圭”。《玉篇·玉部》：“瑑，圭有圻鄂也。”《说文·玉部》：“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彖声。《周礼》曰：‘瑑圭璧。’”所引经文见《春官·典瑞》，郑注引郑司农曰：“瑑有圻鄂瑑起。”孙诒让疏：“此瑑圭亦有刻文隆起，故云有圻鄂瑑起也。”上文所引三例起阳线的圭，则可视为瑑圭之早期的实例，它们正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创造出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饰立鸟与神面的小型圭于近底端之中部有单面钻成的圆穿，其上方有一较大的圆孔，孔内镶绿松石圆片。镶嵌绿松石本是大汶口—龙山系统玉器工艺的特色。山东五莲丹土遗址的窖穴中与龙山陶片共出的玉钺，长 30.8、宽 8.8 厘米，接近圭形，其居中偏上的圆孔内镶绿松石片^[14]。山东临朐朱封龙山大墓出土的玉头饰，在白玉饰件上反正两面牢固地镶有四颗绿松石圆片^[15]。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小型玉圭的做法也遵循这一传统。故构成上述饰立鸟与神面的玉圭之诸要素，均符合山东龙山文化的性格。

在图 1-5:1 所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圭上，其立鸟于腹部正中还刻出一人面，虽已高度图案化，但耳、目、口、鼻都很清楚。其他几件玉圭之鸟腹上的人面更为简化，初看时几乎认不出，但经过比较，仍能找到其演变的轨迹。特别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神面，顶部也呈介字形，背面却雕琢出凸起的立鸟纹，已将鸟和神面完全结合在一起（图 1-12:4）^[16]。这种安排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此鸟具有



图 1-6 立鸟纹残玉件，商晚期
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出土

人格神身分。联系山东地区上古时代的传说加以考察，又应与东夷集团的先祖少昊有关。少昊族的活动范围以曲阜为中心。《左传·定公四年》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记郑子对鲁昭公说其先祖少昊名摯。郑子为少昊的后人，是一位学者，孔子曾向他请益，所言应有一定的可信性。《逸周书·尝麦篇》也说：“乃命少昊清司马（孙诒让《周书

斟补》疑‘司马’当作‘始为’）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质、摯古通（《考工记·函人》郑注），在这里应读鸞。《诗·周南·关雎》毛传“鸟摯而有别”，陆德明释文：“摯，本亦作鸞。”《慧琳音义》卷三二“鸞鸟”注引《通俗文》更称：“摯，鸞鸞之类，鸞鸞之属也。”少昊名摯，即鸞，正与其统领鸟师的地位相称。上述天津博物馆所藏玉件上的立鸟，钩喙利距，十分英武，头上的冠毛和翼上的翎毛都被着意刻画，固非猛禽莫属，联系《通俗文》之说，此鸟应即鸞鸟。再看其他几件玉圭上的立鸟，无例外地都采取鸞鸟的造型。这一点与良渚玉器上的鸟纹颇不相同，后者并未强调其喙爪之尖利，就显得不那么威风了（图 1-7）。

说立鸟即鸞、代表少昊，并非望文生义。把它和上述天津博物馆玉件的基座结合起来考察，其中的含义会透露得更加清晰。此基座顶部有两条扬起的带鸟头的弧状物向左右探出，呈倒八字形。在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刻纹中，这一图形并不陌生。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及诸城前寨等地之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厚胎大陶尊，有的在显著位置上刻出图形符号。其中一种与立鸟玉件之基座部分相类似的符号涂有朱色（图 1-8:1）^[17]。不仅此符号涂朱，而且它上部正中的  形有时还单独刻在尊上，也涂朱（图 1-8:4）^[18]；地位之尊显自不待言。研究者或谓图 1-8:1、2 之形代表“盆式器”，不确^[19]。因为单独的  形与一期甲文“示”字作 、 形者肖似^[20]。示就是神主之主。甲文“示壬”（《合》1253 正）、“示癸”（《合》1257），《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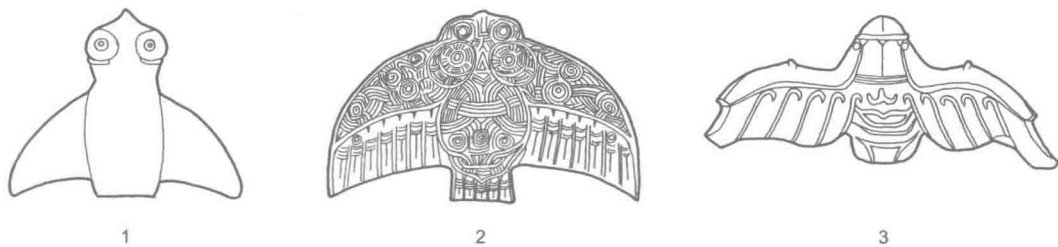


图 1-7 玉立鸟

- 1、2.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
3.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

记·殷本纪》作“主壬”、“主癸”。“主谓木主也”（《周礼·司巫》杜注），“主盖神之所冯”（《穀梁传·文公二年》范注）。故图 1-8:1、2 之陶文实代表置于基座上的木神主。上述玉件上的鸷鸟和神面的组合正相当大汶口陶文上的神主，只不过更加形象化，更加矜贵、直观而具体。神主当然是用于祖先崇拜的。因此以基座承托起的鸷鸟与神面，应当被认为是相当神主的复合神徽，代表其祖先神少昊。

少昊族有“以鸟名官”的传说。“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鸛鸠氏，司马也；鸛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研究者或以此作为我国古代存在图腾制的证据，认定少昊族为鸟图腾；故此玉鸷也随之而成为图腾崇拜物了。但《左传》在下文中接着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及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杨伯峻注：“颛顼乃继少皞为帝，其官有南正、火正，不用鸟、云、龙、火、水等名为官名，即‘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其不能以龙、鸟纪者，无远来之天瑞，故以就近之民事为官名。”可见五鸟、五鸠等纯属职官之名；至颛顼时此制已废，“以就近之民事为官名”，说明它仅为一代之官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更与氏族组织无密不可分的联系。又如金景芳先生认为：“这段文字所说的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等专职和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以及五工正、九农正等等，都是后世始有，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21]。果如是，则主张“以鸟名官”代表图腾之说更失去依据。这件玉鸷只能被看作是备受尊崇的具象化的始祖神，而不宜与图腾制度相牵附。

有学者认为图腾制是人类原始时期的普遍存在，是为稳定族外对婚制而建立起的社會制度。但这一论断难以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我国新石器时代绵延数千年，已发掘的墓葬数不胜数，然而并未获得坚实可靠之证明图腾制存在的根据，在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找不出它有哪种特殊的图腾符号。就婚姻制度而论，我国古代实行的是“同姓不婚”。姓来自氏族，同姓不婚就可以避免在同一氏族内部通婚。《国语·晋语四》：“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因此，无须通过图腾制也能理顺婚姻关系。又有学者认为商代铜器中有“玄鸟妇壶”（《三代》12·2·1），谓：“玄鸟妇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图绘文字，它象征着作壶的贵妇人系玄鸟图腾的后裔是很明显的。”^[22]《诗·商颂·玄鸟》中还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毛传：“玄鸟，𪚩也。”𪚩即燕子。郑笺：“天使𪚩下而生商者，谓𪚩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因而不少人认为商王室以玄鸟为图腾。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始祖诞生神话，却并不都发展成图腾制度。玄鸟生商，履武兴周。《史记·周本纪》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及期而生稷。”如果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则周人岂不应以大脚印为图腾？这种设想，显然是讲不通的。玄鸟与商族的关系虽于文献有征，但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商的高祖王亥之亥字，甲文中有时书作𪚩^[23]，也被往鸟图腾上牵合。其实均经不起推敲。李学勤先生说：“玄鸟妇壶”“实际是一件方罍，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19·14，……照片见《商周彝器通考》778。”“方罍铭应合读为‘亚𪚩，𪚩妇’。‘亚𪚩’是族氏，‘𪚩妇’是器主。”“甲骨卜辞‘兹用’，有时省成‘么用’，因而‘𪚩’很可能就是‘𪚩’字。‘𪚩’字在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过。这样看来，青铜器铭文中并未出现‘玄鸟’一词。”^[24]至于王亥之亥字，卜辞中也并不都写作“𪚩”，写作“亥”的场合也很多（《后上》1·1，19·1，21·13；《南明》66，476；《粹》75）。𪚩应是一种鸟名，借作亥字。如果认为王𪚩之亥上的佳代表图腾，那么它只能是玄鸟（燕子），但卜辞中未见王亥之亥作𪚩（𪚩）形者。相反，此字或作𪚩（《粹》51），亥上之字为萑。《说文·萑部》：“萑，雌属。从佳，从艹，有毛角。所鸣其民有祸。”卜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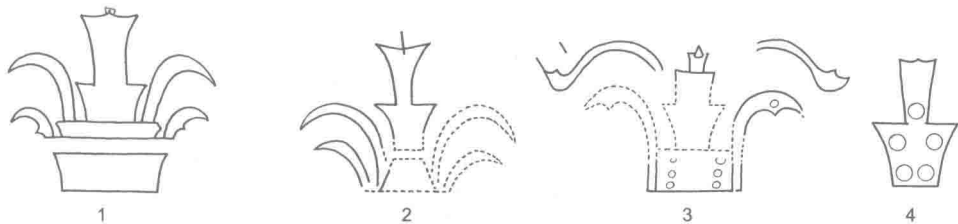


图 1-8 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陶尊上的刻纹

1. 山东莒县陵阳河 17 号墓出土
2. 陵阳河 11 号墓出土
3. 江苏南京北阴阳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
4. 陵阳河采集

中萑之繁体作萑，也被视为不祥之鸟。如云，“王其遘萑，又大乙”（《南明》545），即因为遭遇萑鸟而向大乙侑祭以求福佑。本来说商王室的图腾是玄鸟，在这里却变成萑即猫头鹰之类恶鸟，势将无法解释。又王亥之亥或作（《宁》1·141；《京》3926；《掇》1·455）。上部从隹从又，乃是隻字，即获，训捕获，将它加在亥字上，殊无义理。目前虽不明其造字之用意，但鸟图腾总不能用“隻”字来表示。又主图腾说者或引《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以证明王亥与鸟图腾的关系^[25]。其实所引之句全文为：“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那么王亥是正在吃他的图腾，就更讲不通了。可是上世纪前半叶，图腾主义曾在我国学术界泛滥一时，有些大名家也说了不少过头话；近年图腾说又有回潮之势。对此，社科院文学所的施爱东先生认为：“文献记载也好，图像表达也好，出现动植物，以及动物神、植物神，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与所谓的图腾主义可以毫无关系。可是，图腾学者们只要从中看见一点动植物的影子，马上就将之断为图腾，以至于无时无处不图腾，这实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26]

撇开图腾说，在这件体积不大的玉鸮形神主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各部族之间通过影响、交流、吸收、融汇，而在意识形态的深层中产生的共性。山东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久为人所熟知。大汶口之带座神主式的记号曾在南京北阴阳营所出良渚陶尊残片上发现（图 1-8:3）^[27]。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良渚玉镯，一面刻有大汶口式的意符文字，另一面刻出一个带座神主的形象（图 1-9）。其顶部的图案类似良渚之玉梳背，而玉梳背上缘之独特的曲线在当时具有神圣的意味^[28]。有些梳背当中饰以神面，神面两侧为喙部外向之二鸟（图 1-10）。而天津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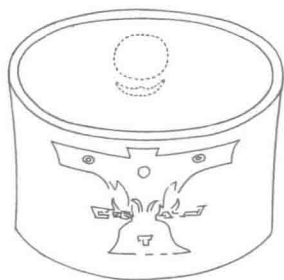


图 1-9 玉镯，良渚文化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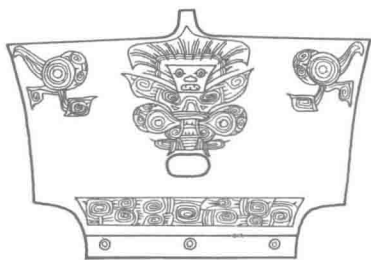


图 1-10 玉梳背，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 2 号墓
出土(右)

物馆的玉鸮形神主的基座上上部也刻出相背之二鸟。又良渚玉件中还有在神面左右安排两个侧视的人像者(图 1-11:1、2)，而在山东龙山文化玉件的刻纹中也有这类构图(图 1-11:3)。它们中间竟有如此众多的相通之处，实足令人惊异。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还能发现这种共性存在于时空距离极其悬远的中国上古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清宫旧藏之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上的神面纹，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福格美术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神面形玉件的图案极相似(图 1-12:1~4)^[29]；后三件亦应属于龙山文化。在石家河文化中，神面变成平顶，但面部一仍旧贯(图 1-12:5)^[30]。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所藏神面形玉件沿袭了这种形制，但已经进入历史时期，似是夏或早商之物(图 1-12:6)^[3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者^[32]、与陕西长安县沣西 17 号西周墓所出者仍无多大变化(图 1-12:7、8)^[33]。直接将山东龙山文化与西周文化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只能从上古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共性来解释。又以前曾将这类神面上部两侧的凸起物视作角，甚至指为牛角；从而把石家河出土的玉神面断为蚩尤族群在黄淮下游败绩后迁移至长江中游时所制“头戴牛角”的蚩尤神像^[34]。而将视角转移到上古中国人的共性上，则对它似不必作出如此迂回的解释。何况与四川广汉三星堆 2 号坑所出青铜人面相较，此突出物其实不是角，而是耳朵(图 1-13)^[35]。古代中国仙灵以大耳为特征。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之内棺所绘操多援戈及多戈戟的神怪，耳朵就非常大(图 1-14)^[36]。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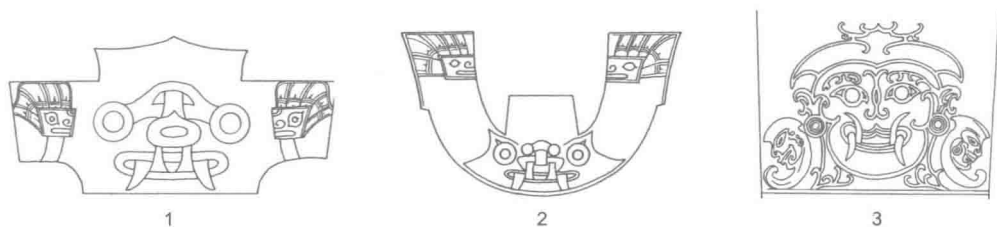


图 1-11 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之玉器刻纹的比较

1. 良渚文化玉冠饰，反山 16 号墓出土
2. 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瑶山 7 号墓出土
3. 山东龙山文化玉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汉晋时，仙人仍然“耳出于顶”^[37]。考虑到这一层，则石家河之玉神面上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就不一定和蚩尤相联系了。

再如在我国许多考古学文化的出土物中，都有将龟背甲与腹甲相缚合、内盛石子等物之龟盒，据推测乃是一种占卜用具。它在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及江苏邳县刘林等大汶口文化墓葬、四川巫山大溪之大溪文化墓葬中都发现过^[38]。古人还有此型玉制品。辽宁朝阳牛河梁第 2 地点的红山文化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的薛家岗文化墓葬、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房址、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山西曲沃曲村西周晋侯墓中均曾出土（图 1-15）^[39]。和玉神面一样，它们也必然以相同的宗教意念和神话背景为土壤，而且这种认识看来还相当牢固，相当深入人心。上古时代，华夏族尽管分布在全国各地，支派众多，却拥有基本相同的语言文字。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用带翻译，秦始皇时之“书同文”也只不过是统一了同一种文字的字体。中华古民族在遥远的时代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各地出土的若干生活用品如陶器之造型上的差别，和这种笼罩天下、超越区系的共性相比较，就显得未免次要了。因为只有这样，那些相当独特的纹样和器物，才能穿越广袤的时空，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以基本相同的面貌出现。

中华古民族的文化是多源的，但彼此之间并不是互相封闭，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多源共汇，形成了统一的中华古文化。这件小小的玉鸞形神主也在这方面给人以宝贵的启示。